

中美社会学的十年交流对 中国社会学的影响

邓 方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学像中国社会学这样命运多舛，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剥夺了生存权利达28年之久。1978年，与中美建交同一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会（原名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宣告成立，社会学在中国终于取得了它应当具有的地位。

中美建交打开了学术交流的大门，但是，在1978年的社会学领域内，交流双方的实力相当悬殊。“美国是当代社会学的世界首领。”^①美国社会学会有会员12000人。仅1978年一年，美国各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共有600人，获得硕士学位的1600人，获得学士学位的23000人。^②在美国的3000多所高等院校中，几乎没有一所不讲授社会学。对263所院校的抽样研究表明，每个学校平均设有14门社会学课程。^③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在本世纪30、40年代，曾被认为仅次于北美、西欧。但是在1978年，中国没有一名社会学专业人员；被迫改行而可能归队的社会学工作者不足百人，其中最年轻的，即1952年社会学被取消以前，从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也已经超过了50岁。

1978年的中国社会学，与美国社会学刚接触，犹如赤贫者面对金山。中国社会学怎样借中美建交之东风，在交流中求得新生与发展？1922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纽约，勉励中国留学生：如果你们的老师既有金子，又有点石成金的方法，你们首先要学的应该是后者。^④学习“点金术”，这是中国社会学在与美国社会学进行学术交流时所遵循的宗旨。这种“点金术”的学习，具体表现为：研究现状，明确差距，奋起直追；研究历史，他人之路，引为借鉴。

明确差距 奋起直追

中国重建社会学，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自1979年，中国社会学界与国外社会学机构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往，其中与美国社会学界的交流最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最近两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共接待外国社会学家26人，其中一半来自美国。^⑤在来访的美国代表团中，规模最大的是1984年2月，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组织，包括10名著名学者的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代表团。10年当中，不少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访问过中国。他们是：曾先后担任美

①（美）阿·英格尔斯：《社会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71页。

②《美国统计摘要》（1978），第435页。

③同①，第159页。

④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17页。

⑤此数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综合处提供。

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的布劳 (D·Blau)、怀特 (w·whyte) 和罗西 (A·Ross), 现代化理论专家英格尔斯 (A·Inkeles), 未来学家托夫勒 (A·Toffler) 和著名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李树青、林南等。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王康、袁方、何肇发和苏驼等, 也曾先后出访美国。目前, 在美国各大学学习社会学的中国学生达数百人。其中, 某些大学的中国学生在社会学系所占比例之高, 令人吃惊。例如: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988年录取博士研究生25人, 其中9人是中国学生 (不包括台湾及香港学生), 比例高达36%。

中国重建社会学之初, 人才奇缺是最严重的问题。为了尽快培养人才, 中国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起, 先后于1980年和1981年在北京举办了两期社会学讲习班。这是中国在社会学恢复以后, 第一次进行社会学专业人员的培养工作。参加讲习班的共有一百多人, 他们都是30岁至50岁的中青年社会科学科研与教学人员。这两期讲习班的外籍教授全部由美国社会学家担任。例如: 第二期讲习班有7名美国教授, 他们讲授了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应用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概论等。在这期讲习班上, 还有3名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社会学家作了“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势”等专题讲演。数年来, 这两期讲习班的学员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 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

中美社会学界的频繁交往, 为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学习与发展的良好机会。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在继承本国社会学传统的同时, 通过与美国社会学的交流, 逐渐明确了本国传统与当代社会学的差距。本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 曾以深入的社区研究 (Community Study) 在国际社会学界享有盛名。例如: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年出版) 曾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 陈达以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区人口普查资料为主, 撰写的《现代中国人口》, 曾于1946年7月, 在美国最有影响的社会学杂志——芝加哥大学的《美国社会学杂志》上, 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发表。此外, 李景汉的《定县调查》, 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欧美社会学界的重视。但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社会学发展迅速。其中最显著的是美国社会学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 这一学派对于国际社会学的发展影响重大。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重点是个人行为问题, 研究方法是抽样、问卷调查、计算机处理资料及应用社会统计技术进行分析。这些与30、4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有很大差别。这种差距使中国社会学工作者产生了迎头赶上的紧迫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与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座谈时指出: “现在的问题, 在于我们对20世纪下半期以来所发展起来的许多方法太不熟悉了, ……我们需要首先掌握现代社会学所积累起来的资料和它所使用的方法。”^① 介绍和学习美国社会学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 这是中美社会学初期交流的主要内容。在这期间, 中国社会学界除了邀请美国学者开设社会统计课程之外, 不少大学的社会学系还以美国社会统计学专家布莱洛克 (H·Blalock) 的“社会统计学” (Social Statistics) 和贝利 (H·Bailey) 的“社会研究方法”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为教材。这种交流的成果十分显著, 例如: 1984年夏, 中国重建社会学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在北京大学毕业, 这些研究生在毕业论文中, 都使用了计算机处理资料, 并运用了回归分析 (OLS Regression)、通路分析 (Path Analysis) 等先进的统计分析技术。

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创办了《国外社会学》杂志 (原名《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自此, 中国社会学界开始了对于美国社会学理论较为正式的传播。几年来, 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学通讯》, 1981年第1期第14页。

登在《国外社会学》上介绍美国社会学理论的文章已有数十篇，其中以译著为主，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介绍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以及他们的理论，例如：帕森斯(T·Parsons)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霍曼斯(G·Homans)和交换行为主义(Exchange Behaviorism)，布卢默(H·Blumer)和象征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以及布劳(P·Blau)和宏观结构主义(Macrostructuralism)等。尽管这些介绍都是初步的，但这是中国社会学界第一次接触战后的美国社会学理论。第二，介绍美国社会学家对经典社会学家的评述，例如：对孔德(A·Comte)、迪尔凯姆(E·Durkheim)和韦伯(M·Weber)等人的评述。这类文章反映了美国社会学与传统社会学的联系。第三，介绍美国分支社会学，例如：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人口社会学等。这些分支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是战后美国社会学的重要特征。

介绍美国社会学理论的第一步是初步而且低姿态的，其结果，深刻评述美国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提了出来。1986年1月发表的“重建社会学掠影”一文中指出：“国内社会学缺乏对社会学的总体理论和研究方法作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缺乏对国外社会学理论及研究成果的评价和借鉴。”^①这种要求反映出中国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兴趣正在逐步提高。自1984年以来，一些美国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著作已经和正在陆续翻译出版，其中有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默顿(R·Merton)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以及特纳(J·Turner)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等。目前，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国外社会学名著》丛书编委会，正准备推出一批美国社会学名著。这个编委会聘请的国外顾问，全部由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承担，这一切都是在介绍美国社会学理论方面所进行的重要工作，这些工作为深刻评价和借鉴美国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从中美学术交流中获益匪浅。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老一辈中国社会学家的辛勤培育，中青年社会学工作者的奋发努力，使得中国社会学在重建中获得迅速发展。根据截至1988年7月的统计，中国已有社会学的专职教学、科研人员1000多人，社会学学会35个。全国有12所高校设立了社会学系(专业)。

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中，社会学承担并完成了“小城镇研究”、在中国五大城市(京、津、沪、成都、武汉)抽样5000人的“婚姻与家庭研究”、样本规模为两万的“当代中国青年工人的状况”以及“我国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和问题”等重要科研项目。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均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好评。在1986年10月提出的“七五”期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社会学学科又承担了13项国家重点课题。

他人之路 引为借鉴

如何建立中国的社会学？这是中国社会学自1978年重建以来，社会学工作者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对此问题尽管答案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为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必须认真研究国外社会学的发展，不仅要研究现状，而且要研究历史。这种研究不能够浅尝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第88页。

止，而应当深入探索。

当前，影响建立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障碍是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认识不足。有人把社会学仅仅视作关于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或是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调查方法的技术性学科。对社会学的性质认识不足，自然容易把社会学中国化与研究国外社会学相对立。因为如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只是一般社会问题，那么社会问题因国而异，只要立足于本国即可。如果社会学仅仅是一种社会调查方法，那么只需把国外的调查方法拿过来，其余的事情只是用中国的材料加以填充。为建立中国的社会学，正确认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具有的性质，势在必行。

怎样加深对社会学性质的认识呢？当这门学科在中国中断28年以后，认真研究国外社会学的发展，是一条捷径。分析本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学两个主要学派的兴替，中国社会学是可以引他人之路，以为借鉴的。

美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两个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派是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它们集中表现了美国社会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它们的研究重点及研究方法分别统治了美国社会学各30年。

芝加哥学派诞生于本世纪初，其繁荣时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着农村社会(Rural Society)向城市社会(Urban Society)的变动。当时的芝加哥城把这场变革的主要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芝加哥是美国中西部交通、商业及金融中心；同时，在开发西部的进军中，它是美国文明的前哨。1840年，芝加哥是个仅有4 000多人的小镇；1890年，它的人口数量达到100多万。^①人口暴涨使芝加哥在美国城市排列中从第二十三位跃居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纽约的大都市，但城市人口激增还不能全面反映这种社会变动，移民的大量流入，才是美国这场社会变革的最显著特点。1900年，芝加哥市170万人口中，二分之一在美国之外出生。“新芝加哥人”中，有从中西部大批涌来的农民，但更多的人来自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移民的泛滥，多种文化的混合，使由于城市人口激增所造成的社会失控陷入几乎无法扭转的危局。整座城市动荡不安。1910年，斯蒂芬斯(L. Steffens)曾这样描述：“芝加哥充满了暴力，肮脏不堪，人们无法无天，相互憎恨，处处喧闹。它敞开着犯罪的大门；它进行着厚颜无耻的交易；它无知而又野蛮。”^②

芝加哥学派从创立之初，就把自身的命运与这座“邪恶之城”联系在一起了，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斯莫尔(A. Small)作为学派创始人曾提出：“社会学应当为芝加哥的社会改革作出贡献。”^③这个学派的其他重要成员也对芝加哥的前途充满关注和热情。他们把城市当作“社会实验室”，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重点涉及城市社会问题、移民及其同化及社区亚文化等。这种社会研究所包含的前提是：揭露社会问题可以促进城市正常秩序的建立。当36万波兰移民涌入芝加哥后，这个城市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华沙和罗兹的第三个最大的波兰人聚居区。1918年至1920年，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W. Thomas)教授和助手一起，研究了这种大规模群体迁移中的移民同化问题，发表了题为“波兰农民在欧洲

① 本节统计数字，均引自Martin Bulm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12—28.

② Jane Addams, "Twenty Years at Hull—House" (New York, Signet, 1960) P. X.

③ Martin Bulm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23.

和美国”的论文。这篇论文被公认是美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帕克(R·Park)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在他的指导下,一批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的论文涌现出来,如:《芝加哥的黑人》(约翰逊,1922)、《黄金海岸和贫民窟》(佐尔博,1929)等,这些论文后来都成为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社会问题研究的经典著作。

芝加哥学派开创了美国社会学的一个新时代。它所倡导的社区实地研究,从根本上扭转了美国社会学以理论研究为重点的发展方向。这个学派对城市化及由之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社区调查、参与性观察、定性分析等,在30年内统治着整个美国社会学。本世纪40年代初,移民浪潮趋于平缓,城市秩序走向正常化。美国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这一历史时期基本结束,芝加哥学派也逐渐衰落。

哥伦比亚学派起始于本世纪40年代,它的研究重点不再是城市社会问题,而是个人行为问题。如:读者与听众研究(Audience Research)和市场研究(Market Research)。研究方法也改变了,小范围的社区调查为全国性的抽样所代替;研究者不再进行参与性观察而改用问卷搜集资料;计算机处理资料及一系列统计技术的应用,使得精确的定量分析取代了定性分析。哥伦比亚学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拉扎斯菲尔德(P·Lazarsfeld),他是一位数学博士,后来兴趣转向社会学,1940年,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世纪40年代,继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之后,美国社会又经历着另一场变动,这是社会结构从地方互动(Local Interaction)到全国互动(National Interaction)的一种转变。全国市场的出现是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1940年以后,美国消费品制造业的集中趋势发展很快。战后(1945——1949)大公司兼并的企业数是战前(1935——1939)的3倍。^①50年代后,这种趋势发展更快。兼并与集中使市场由局部扩大为全国。大众媒介也在同期取得了重大发展。与30年代初期相比,1946年,全国期刊发行量增加了两亿多份,电台数量增加了200%,有收音机的家庭增加了282%,达3400万户。^②1946年后,增长趋势持续不减。几家主要的期刊及广播公司控制着全国大部分读者与听众。以大众媒介的发展为前提,广告业迅速兴起,充当全国市场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中介人。这时,人们的注意力从各自的社区转向全国,依据来自全国的信息作出各种决定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全国市场的出现带来了社会互动结构的转变。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已不再是老板与顾客面对面地讨价还价;纽约人依据报刊上的广告便可决定购买洛杉矶食品公司的产品。全国市场加强了个人在社会互动结构中的地位。在地方化的社会互动结构中,个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际关系,个人与家庭的联系及个人在社区内的影响。但在全国化的互动结构中,个人成为全国市场的组成部分,任何传统的社会关系都不再限制他的发展。社会互动从地方化到全国化的这种转变,使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地区性的新型互动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一极是全国性的大公司,另一极是个人。两极依赖大众媒介来连接。这种联系方式是非直接的。

美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提出一类新的社会问题,即个人行为的研究问题,例如,读者与听众研究和市场研究问题。大公司与个人之间的间接联系,造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结

① (美)林克等:《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文版,1983年6月版,第300页。

② 《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1976年版),第775页。

构性的距离。生产者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却没有渠道收集遍布全国各地的消费者信息。影响产品销售的原因是什么？新的生产计划该怎样制定？这一切都含混不清。在大众媒介的传播中，也有因能力有限而难以寻求答案的问题，如：有多少听众收听某广播公司的某一专题节目？什么样的读者阅读刊登在杂志上的广告？

拉扎斯菲尔德首先参与了读者与听众研究。40年代初，他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所在的纽约市是全国商业、金融业中心，广告业中心及大众媒介传播中心，这成为哥伦比亚学派发展的重要条件。应用社会学研究所通过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为美国新的社会结构中相距甚远的两极（大公司和个人）创造了联系的机会。拉扎斯菲尔德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培养了一代年轻的定量分析社会学家。在其后的30年内，哥伦比亚学派以个人行为为中心的研究重点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统治着整个美国社会学。

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可以认识社会学的哪些性质呢？

第一，社会学并非仅仅研究一般的社会问题，社会学的目光集中于社会结构的变动。这里的社会结构是指个人行动按照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模式结合成社会行动。那种把社会学仅仅理解为对于社会问题调查研究的认识之所以失之偏颇，是由于对社会问题的本质缺乏区别与分析。在哥伦比亚学派时代，美国仍然存在着暴力、贫穷与种族歧视，这些曾是芝加哥学派所研究的社会问题。但是，哥伦比亚学派把注意力转向了读者与听众研究、市场研究等以个人行为为中心的新问题。正是这种研究方向的转移，促成了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可见，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影响；而同一时期的不同问题也有影响大小之分。

为什么“社会问题”具有不同的影响？怎样选择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首先应理解“结构断裂”这一社会特征。在美国，每一种新社会结构的形成都要经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漫长过程；在这过程之初，旧的社会结构瓦解了，新的社会结构尚待健全。这时社会呈现的特征是“结构断裂”。结构断裂使得个人行动结合为社会行动的过程出现障碍，从而导致社会失序；它所酿成的社会问题影响重大，因而成为社会学的研究重点。

本世纪美国社会第一次结构断裂发生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当千百万移民涌入城市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脱离原有社会组织，进入了现代生活。”^①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遵循的民俗民规已经失效，新的社会规范是什么？大批移民对于城市社会关系的无所适从，显示了结构断裂的特征。正是这种结构断裂酿成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问题。

第二次结构断裂发生在美国社会互动结构从地方化到全国化的转变中。全国性市场造就了以个人为一极，以全国性大公司为另一极的新的社会互动结构。这种结构把大公司的兴衰存亡与消费者的个人行为紧密连接在一起，个人行为以前所未有的魅力吸引着大公司的目光，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过长，使得在地方化互动结构中直接考察个人行为的大多数方法无效。全国性大公司对于消费者个人行为的考察无能为力，这又一次显示了结构断裂的特征。第二次结构断裂酿成了哥伦比亚学派所研究的社会问题。

芝加哥学派所研究的暴力、贫穷与种族歧视，曾经是美国社会结构断裂的产物；但在哥

^① Martin Bulm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50.

伦比亚学派时代，第二次结构断裂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前者。“社会问题”之所以具有不同的影响，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所造成的。社会学要选择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必须以社会结构的变动为研究对象。事实上，也只有认识到社会学的这一性质，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学派，总是与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动相伴而生；为什么这两个在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上截然不同的学派，却都能够统治美国社会学达30年之久。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重大的变动。如果中国社会学工作者能够从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中，进一步学习选择“问题”的标准，认真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重大社会问题，中国的社会学必将获得迅速发展。

第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为研究内容服务的，因而它是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社会学的全部；它是发展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一种神秘感。人们不知道飞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和名目繁多的统计分析方法已经和将要吧社会学引向何方。这种神秘感使人们容易夸大社会学研究方法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事实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研究内容。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但他们在美国社会学界同样占据了30年的统治地位。可见决定这种地位的不仅仅是研究方法。

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以城市社会问题为研究重点，它的研究方法是社区调查，参与性观察和定性分析等。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重点转向个人行为问题，研究方法也随之改变为抽样、问卷调查及统计定量分析等。正是这种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的一致，促进了这两大学派的形成，并决定了它们在美国社会学界的统治地位。

社会学研究方法存在的意义在于它服务于研究内容。如果把社会学理解为仅仅是一门研究社会调查方法的学科，将难以解释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发展与衰落。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在发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必然将随之变化。在建立中国社会学的过程中，认识到社会学的这一性质，是大多裨益的。

中美建交已经十周年了，回顾中国社会学通过中美学术交流已经和正在获得的发展，人们犹如看到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正在变得步履稳健，他正在朝着一个目标前进，那目标就是：“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当达到目标那一天到来时，相信美国社会学家一定和中国社会学家一样为之振奋。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宛丽